

# 西方传教士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影响浅析

杨大勇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西方资本主义对华宗教侵略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的办学行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成了近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形成,传播西学,引进了西方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推动了现代学制的产生,开创了特殊教育的先河等方面。

**【关键词】**西方传教士;贵州;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139-03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一直通过传教士、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对此,应一分为二地认识。应当看到,教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也有积极的一面。尽管传教士们在华办学是为了培养能够效忠于教会的中国领袖人物,但实际上,教会教育对促进我国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的发展,对传播西学和西艺,都起了积极作用。

就贵州近代教育而言,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贵州近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倡导者

近代以前,中国虽然出了不少的自然科学家,但却没有一所学校讲授自然科学课程。到了清代,学校更是无不唯科举是上,致使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同时讲授中西学的学校,却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教而设立的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系统学制。从育婴堂、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教育。从学校性质划分,又包括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函授教育和女子教育等,到20世纪3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形成完备体系。

幼稚园是教会学校倡导的各类学校的起点,起初主要是承担教会在华布道人员及中国教牧人员子弟的教育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贵州创办的幼稚园也开始接收中国人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如1940年贵阳的敬一幼稚园有幼儿80多人,1941年德慧幼稚园入园人数达100多人,同时还有其它地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幼稚园,而当时全省非教会办的幼儿园才6所。

中、小学是各教会在贵州办学的主要形式。虽然与全国相比,教会学校在贵州数量不多,学生数也不多,以及与贵州非教会办的学校相比无论学校

与学生数占的比率均较小,但其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却有许多值得借鉴,如柏格里在贵州石门坎苗区使用其研制的老苗文进行双语教学,对贵州民族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这同时,传教士也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学校,如贵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补习学校,采取多形式、多科目的单科补习教学;基督教总会在贵阳办的贵阳函授学校,招收大学生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天主教在贵阳的程万中学设工农两专科各1班,除按当时教育部制定的教学计划及课程标准进行教学外,还开设法语选修班,供学生课外时间选修,等等。

民国时期,贵州仅有大学3所,其中教会办的湘雅医学院优于课程开设的系统性和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对近代贵州的大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上述学校虽办学目的各异,但构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贵州近代教育制度从此开始呈现综合化、多样化的特征。

## 二 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对贵州近代教育产生影响

西方传教士普遍认为科学和数学是训练学生推理能力所不可缺少的,西方历史和地理则是构成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成分,因此,为了培养出胜过旧式士大夫的教会所需要的人才,教会学校普遍开设了自然科学、西方历史和地理等课程。

如1894年党居仁在安顺创办的安顺苗民义务学校开设的课程为圣经、国文、算术;平塘县教会小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讲经、修身、算学、地理、历史、农业、手工、图画、自然;贵阳北堂的大修院讲授神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宇宙学、伦理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矿物,等。

在这些教会学校里,不仅包括中国的传统科目,也增加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同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杨大勇(1968—),男,贵州铜仁人,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民族教育。

时设有诗歌、体操等课,德智体美均有所兼顾,与中国以圣人之说、经学为主的传统课程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变革,不仅传播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知识,对于学生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也为中国近代课程的转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贵州中小学界是较新颖的,具有启蒙作用。

在教学方法上,传统中国教育以教师输入为主,讲解和背诵是基本方法,忽视思维训练。教会学校则注重启发、理解和学生分析能力的提高,强调由学生自己操作进行科学实验,或由教师进行演示实验的实践式教学方法,教师还注意创办俱乐部、辩论会、合唱队、英法语培训班等等,以培养学生和各种实际运用能力。所有这些,对当时的中国及贵州新式学校教育机构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如天主教在贵阳北堂办的大修院,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天文课设有天文气象观测仪器、负责观察分析;程万中学注重师生关系,要求老师尊重学生,反对“奴才式”的教育;而石门坎教会学校采用教士、汉、苗族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老苗文”编写具有民族内容的课本,进行民族双语教学,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而教学方法的改进及分年级、班级授课的做法,促进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些相对中国传统教育来说是一个大的变革,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三 介绍西方学制,推动了贵州现代学制的产生

作为“局外人”的传教士较早发现了中国教育传统制度的弱点。他们认为,科举教育鼓励读书人把入仕作为最终目标,不利于专门人才的培养。在20世纪前后近10年间,传教士曾纷纷介绍西方学制,虽然内容并不全面,却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学制的制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参照材料。

1896年,中华教育会组织“改革教育委员会”,研究如何为中国拟定“合理”的教育制度,推举林乐知(Allen)起草《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成就》,李佳白(Gilert Reid)起草《改革中国考试制度议》,狄考文起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呈送总理衙门。这是传教士实施其影响中国教育计划的一次重要行动。其中狄考文为学堂设计的课程几乎涉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

1901年,美国传教士郭斐蔚提出中国的学校应分为四级:蒙养学堂、男女分设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1905年林乐知因鉴于中国废除科举后仍轻

视女子教育的状况,提出“欲谋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兴女学不可。”至于学校之等级,宜从幼稚园以至大学,即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

贵州的近代教育在这大环境下亦受到影响。传教士们积极在贵州兴办各种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各种专门学校,直至大学,在近代贵州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且规定了各级学校的修业年限,如三育小学六个年级,石门规中学和程万中学学制为三至四年,湘雅医学院四年,小修院三年,中修院六年,大修院七年等。

中国近代教育变革是以西方教育为参照的。毫无疑问,传教士在华从事教育活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制抱着强烈的个人动机,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传教士的活动对落后传统教育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对贵州及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四 传播西学,影响了贵州近代社会的发展

教会举办的各级教会学校,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如宗教课程过重),但它毕竟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成为当时传播西学的主要场所之一。传教士们抓住了中国陈梦乍醒后一片空白的机缘,不失时机地充当了西学的最初载体,客观上在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如贵阳的青光小学开设汽车驾驶、会计、无线电培训、钢琴课;内迁的湘雅医学院有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有机化学、解剖学、组织学、细菌学、病理学、内外科、儿妇科、放射科等学科;贵阳天主教的大修院开设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矿物等课程;贵州石门坎教会学校的平民教育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注重西洋音乐的教育,如小号、口琴、风琴、五线谱等。上述情形,既是传播西学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区别封建旧教育的主要特征。

传教士大批来华是在中国闭关自守政策业已松绑的时刻,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人民在开展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意识到需要学习日新月异的西学知识,了解西方。传教士适应了西学东渐的潮流,把传教和宣传西学结合起来,成为先进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媒介,在客观上起到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近代改革。

### 五 开创贵州近代特殊教育的先河

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传教士在全国许多地方

都开办有特殊教育学校,对贵州也进行了广泛的渗透。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教会特殊教育在客观上也对包括贵州在内的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据《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贵州省的盲哑教育始于民国年间的安顺黔光盲哑学校和赫章葛布瞽目学校”——而这两所学校均为教会学校。赫章葛布瞽目学校由基督教内地会于1942年在贵州葛布教区创办,专收盲童;安顺黔光盲哑学校为基督教中华圣公会传教士傅雅各、芮若兰夫妇于1943年在贵州安顺创办,先招盲生,1947年开始招收哑生。两校均于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1987年,贵州全省共有盲聋哑学校3所,而贵州的弱智教育直到1985年也才出现一个“弱智儿童辅导班”。

安顺瞽目学校和葛布盲校的创办,与教会在全

国创办的特殊学校相比数量很少,规模也小,但却开启了贵州特殊教育的先河,冲击了视残疾人无用的保守僵化的社会风气,同时为倍受社会歧视的残疾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在旧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极不健全、特殊教育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客观上为中国特殊教育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作了思想的准备和实践的先行,奠定了贵州特殊教育的基础。

综上,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传教士参与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华宗教侵略遭到中国各阶层的抵制和反抗,但其传播的西学及西方的新教育,如办学模式、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又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起过某种作用,教会学校始肇与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诞生与成长。总之,教会学校、传教士对贵州及中国教育近代历程带来某些积极影响,“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 [2]黄立志.基督教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11.
- [3]吴洪成.中国教会教育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Analyzing on Western Missionary Influences upon Guizhou Modern Education

YANG Da-yong

(Gui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Guiyang, Guizhou 550000)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aggression of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y against China, objectively, Western missionary's behavior of running a school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The impact on Guizhou modern education chiefly show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spreading western education, introducing wester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promoting the produce of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creating a special education, etc.

**Key words:** Western Missionary; Guizhou Province; Modern Educ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